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第2辑/刘利民等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9

ISBN 7-80211-012-2

I. 外…

II. 刘…

III. ①语言学—文集②应用语言学—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7136 号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100035)

电 话:66560272(编辑部) 66560299 66560273(发行部)

h t t p://www.cctpbook.com

E m a i l:edit@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346 千字

印 张:22.75

版 次:200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00 元



中外语言对比

宗教与语言

[日] 山折哲雄 刘 莉 译

美国科学杂志《原子能科学者会报》因用倒计时方式警告核战争危险而闻名，日前它指出：“末日时钟”的指针前进了两分钟，且被设定在世界灭亡前七分钟的深夜 11 时 53 分。为什么此钟指针前进了两分钟呢？其所列举的理由是：恐怖主义的威胁、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ABM）等。同时附有高能物理学者莱昂·麦克斯·莱德曼（Leon Max Lederman）^[1] 博士拨动此大钟指针前进两分钟时的照片^[2]。

代表世界的现代宗教对这个末日时钟两分钟的移动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是抑止的效果，还是促进的效果？此外，在离末日时刻仅剩的七分钟内，宗教最终会起到什么作用呢？

我的预感里充满了这种不安与疑惑，压迫着我的胸腔。但是仔细想一想，这种预感自从 1999 年 1 月发生阪神大地震以来已在我心里萌芽，并逐渐变得强烈。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阪神大地震发生后，面对那些房屋被烧被毁的人们，难道会有基督教徒站出来引用圣经上的语句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3] 吗？在佛教徒方面，情况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吧？这里绝对不会有佛教徒面对因地震而痛苦的人们，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即使有敢说“皈依我佛的慈悲吧”的僧侣，也是会被打耳光的。

基督教徒与佛教徒恐怕并非没有这样说的勇气，而是因为他们深知这些话已经不能触动对方的心灵。《佛典》与《圣经》中的语言，目前的确已经不能触动那些处在痛苦悲伤中的人们的心灵。耶稣的话语曾经可以抚慰贫苦人们的心灵，佛陀的话语也可以震撼痛苦中的人们，但这种现象如今似乎已经看不到了。

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恐怕是因为仅仅拿《佛典》与《圣经》中的语句鹦鹉学舌般地说教，已无法引起人们的心灵共鸣了。“宗教语言”一落千丈，失去了原有的光辉。

现代的宗教家既然想更进一步地靠近人们的心灵，就不该仅仅鹦鹉学舌般地重复耶稣与佛陀的语言，而更应该像耶稣与佛陀那样去生活。我认为即使是半途而废，也只能仿效像耶稣与佛陀这样宗教鼻祖的语言及行为。但是在普通的宗教家中，几乎没有人能仿效耶稣与佛陀，敢冒那种危险。我认为或许就是鉴于此种原因，在阪神大地震的受灾现场看不到宗教家的身影。就像媒体和舆论反复报道的那样，活跃在受灾现场的都是从全国各地云集而来的志愿者、精神科医生和生活顾问。

如果这么说，恐怕会立刻遭到反驳：宗教家们不是迅速赶赴受灾现场，走近悲苦人们，投身于身心救助和抚慰的活动吗？确实是这样。我也知道来自很多教团的宗教家们赶赴现场，伸出援助之手。但是，这些宗教家们在现场果真是作为一名宗教家参加救助活动的吗？我无法这么想。不如说，那些赶赴现场的宗教家们，几乎都是作为一名市民志愿者的身份参加活动，或是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生活顾问的身份贴近人们的心灵，不是吗？

面对宗教语言无法触动人们心灵这一现实，许多宗教家们或像志愿者那样参加活动，或突然化身成精神科医生、生活顾问主动地抚慰受灾者的心灵。因此，舆论、媒体的报道就强制规定了这些宗教家们的行为方向。它们并非是支持宗教家的宗教活动，而是支持他们作为志愿者的活动。而且媒体与舆论也并非信任宗教语言，而是对他们所做的心灵看护活动产生了信赖。

我刚才所说的在阪神大地震的受灾现场看不到宗教家的身影，就是这个方面的含义。佛陀的语言与耶稣的语言仅仅只依靠语言，已无法触动人们的心灵，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吧！我作为佛家弟子，近几十年来每天都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这一点。在置身于“宗教”世界的约半个世纪里，我也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在日本，宗教的虚无主义已到了尽头了吧。并非到了日本人的神与佛都已逝去的程度，而是日本宗教本身渐渐走向其灭亡的境地。也并非仅仅是简单的日本宗教的灭亡，我们也正面临着日本宗教本身走向其灭亡的时代。

作为业界用语的宗教语言

刚才我已讲述了宗教语言衰弱的含义。总之就是它已经不能触动人们的心灵。这是由于无神论语言的泛滥而使其失去了出路，变成了仅在特定的领域里通用的一种暗语，而且被贬低到业界用语的水平。

例如“宿業”这个词语，亲鸾^[4]也曾经使用过，是“过去的行为”的意思。这个词语经常被解释成人类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它原有的冲击力已被掩埋在目前流行的词语“DNA”的阴影之下，处于濒临消亡的状态。“業”这个宗教用语，也已步生物学用语“遗传因子”的后尘，基本上处于意思丧失的状态。

“只管打坐”这个词语，不也是渐渐步入相同的命运吗？“只管努力坐禅”是道元^[5]曾用的语言。但是，却无法想像它能够触动现在青年人的心灵。在瑜伽、超脱冥想、新型体操等的涌现之中，它不再被提及。“坐禅”这个词语原有的柔顺之义和冷峻之美也已丧失许久了。

日莲^[6]发明的南无妙法莲华经的念诵行为又如何呢？它是“皈依法华经”的意思，但是像这个词语那样仅限定在特定宗派里使用的例子几乎看不到了，不是吗？它与净土宗的念佛并称，但是念诵行为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念佛的强烈孤高性。从业外人士的角度看，与其说是反映了信仰热情的流露，不如说是突出了宗教语言的自闭倾向。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其理由当然是刚才所谈到的日本社会的世俗化、无神论虚无主义的蔓延等，可举出多种多样的理由来。总之只能说许多宗教语言被文明带来的语言体系的大潮所吞噬、片断化，并被夺走了其所固有的生命力。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细节部分的状况，就可以明白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由于从外部世界的压力所致。

事实胜于雄辩，如果看了日本宗教各教团、各宗派的内部发行的材料，就会一目了然。其中，大量的传统宗教语言在晦涩难懂的神学网络中被采用。当然，并非没有下功夫去用浅显的词语来替换，也并非没有过采用现在流行的妙句。但是可以很快地意识到，

对于那些显示各教团、各宗派个性的重要中心词,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改变。这样宗派越是宣扬其主张,就越是增加宗派间的隔阂,导致业界用语特性的相互竞争,神学的自闭化加深,以及非妥协主张的重复。

再次令我吃惊的是,上面所涉及的神学中心词基本上都是从悟者的角度来解释的,从获救者的角度来说明的。但是从悟者的高度来讲述,并且能被苦恼的平凡人意识所理解、接受的宗教语言是极其少的。虽用华丽的修饰语指明终点,但仅凭生硬的神学语言是无法通过荆棘道路,到达终点的。如圣者般至高无上存在的语言,如罗汉、菩萨般解脱者的语言,仅仅从观念的角度被讲述的场合不少。

历史宗教的耐用年数

当然发展到这种状况,不一定是教团、宗派单方面的原因。例如明治以后的近代佛学不得不事先考虑确立起这样的路线,建立起学问佛教、近代佛教的知识体系。在翻译、挪用西欧哲学风格的“普遍”语言,为建立令人耳目一新的佛教神学,付出了许多艰辛的努力。在这最初的尝试里,西田几多郎和铃木大拙都做出了贡献。

但是,现在我想谈论的当然不是要明确功与过,而是如何打破现代宗教(佛教)的闭塞状态。宗教语言如何面向社会,引起人们心灵反响的问题。为此,首先要抛弃神学语言的一切修饰,回归到佛陀、耶稣的朴实语言,除此以外别无他法,不是吗?但是最终能够做到吗?事态不是已发展到无法后退的地步了吗?

历史宗教的耐用年数或许到某一时刻就会耗尽。它是指像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样的“普遍宗教”,正在渐渐地结束其历史生命的问题。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吧。现在我们的地球,存在着人口爆炸、沙漠化、大气污染、全球变暖等全球性课题。此外,世界各地围绕民族和宗教问题的纠纷也接连不断,甚至开始呈现出激化的迹象。而且南北差距、贫富分化以及特定区域的饥饿、半饥饿状况的扩大等,都促进了发生战乱和流血事件的倾向。

针对这种环境破坏和民族对立的现状,截至目前的历史宗教最终能开出有效的处方吗?又能否显示出历史宗教所极为重视的

“救济”的方法呢？

被称作普遍宗教的“普遍”，它的根基已开始动摇。这也可以说是历史宗教的普遍语言被“文明”带来的语言体系的大潮所吞噬。历史宗教已经失去了青春活力，在不知不觉中也度过了成熟的壮年期和花朵般的全盛期，现在正在走向衰亡和枯死的老年期。

宗教本来就如同文明一样应该经历兴亡交替，如果能这么想，那这就不应该是什么不可思议的现象。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历史宗教正渐渐地走向衰亡、枯死的老年期，如果这么想不是挺好的吗？这样心灰意冷地试想一下，正逐渐走向老年期的历史宗教，在我看来，是同现今高龄化社会中，不断增大的各层老年人，人数是叠加在一起的；是同逐渐接近“寿命”这种耐用年数临界点的高龄者的命运重叠在一起的。已经开始临近耐用年数的历史宗教，果真只剩下对接近寿命界限的高龄者进行心灵看护的能力了吗？这种状况，换句话说，令人想起“老人看护老人”的困难，也就是老人看护尽头的荒凉情景。

宗教与老人问题

老人看护，勿庸置疑就是老人间的问题。据说对这种老人问题，最初包括“65岁问题”和“75岁问题”。前者是涉及伴随退休产生的退休金与医疗费问题，后者就是所说的高龄者看护的问题。

75岁以上的高龄者是指什么呢？是指那些卧床不起或患有痴呆症等病患的高龄者，及如何去照顾处在人生晚年，面临死亡的高龄者的问题。人口少的家庭看护成为难题，而且主要由女性来承担也是极不公平的。并且，“老人看护老人”、“病人看护病人”、“老人看护病人”的危机也在增大。这样下去“看护地狱”的时代定会到来。不，已经到来。所以看护的社会化已到了不可逾越的阶段。看护理所当然地从家庭的手里解放出来而转向社会的协力体制。因此“看护保险”制度就这样开始孕育而生。

据说“看护保险”有很多方法。因为卧床不起或接近此程度的老人数量不断增长，所以“访问看护”、“在家看护”自然成为必要。“访问看护”首先是“身体看护”。就是帮助老人洗澡、活动全身的工作。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家务事援助”的服务项目。这对于孤身

生活的老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因此,虽然是“家务事援助”,但也可以说成“家务事看护”。这样就要对这些不同的看护种类规定相应的费用。因此如何合理设定就成了政府、地方政府、以及提供服务的民间企业都很伤脑筋的问题。

观察这些接连涌现的“看护”语言平行发展,不知何时开始我已经意识到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看护”,斗胆来说就是“宗教看护”的看护。但是这个问题,政府、地方政府、民间企业都怕沾惹是非尽量避免。因此在媒体的报道和政府的公告中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名称。

但是我认为“老人看护”的本质正是“宗教看护”的问题。例如为避免“宗教”这个名称,而改用“心灵看护”、“精神看护”等词汇,但其本质是不会变的。因为我认为对处于75岁问题漩涡中的老人们来说,缩短或延长人的寿命就是“宗教看护”的问题。

原因是仅由看护人和被看护老人两人所组成的封闭空间成了临终时最重要的场面。也就在那时,“宗教”定会闪灭所有的表情,显身而出。此种情景中惟一留下的看护人将如何做才好呢?看护人所处的社会又将如何应对呢?不,混处在这个社会中的历史宗教的责任人,又将以什么样的演说来应对临终前的场面呢?

等待在这里的是令人恐怖的黑暗,是无依无靠的不安和虚无的空间,微微的悲鸣,苦苦的叹息,还能听得到期盼早死的呼声和企盼死亡的牢骚声。这就是安乐死的要求,安乐死看护的要求。这也是医生放弃,护士死心,生活顾问、精神科医生无能为力时的话语。

宗教就像突来的狂风一样是骤然到来的最后瞬间,就是人类经历的所有的宗教幻想和咒术妄想在一时间蜂拥而至的瞬间。

占卜、咒语、神灵降临、真光之业^[7]、驱除邪魔等等,人类诞生以来的种种宗教技术,开始在无能为力的看护人脑中复活。也可以说是语言急剧呪术化的临终场面。与其说语言已经失去了文明化空间的透明性,不如说语言正在以迅猛之势向原始的象征性、语言内在神灵的暗示性倒退,不,并不是倒退,而是向语言本源的复归。

老人的愤恨与镇魂

我们的高龄化社会不是正上演着这种肉眼看不到的戏剧吗？而且老人们也已渐渐开始意识到这个时代的变调。当然不是所有的正走向高龄期的老人们都能觉察到这个时代的气氛。但是，这种变调的不适征兆正在悄悄地向我们身边靠近。而且这种势头开始呈现扩散的迹象。

这就是老人犯罪增多的现象。试举几个例子。例如去年 11 月份发现的福岛保险金杀人案。以 73 岁的老妇人为主犯的 6 位高龄者接连犯下保险金杀人的罪行。六位犯人的平均年龄约是 60 岁，而且他们的年龄段是在 52 岁到主犯的 73 岁之间，因而令人震惊。据说 73 岁的主犯是当地有名的礼仪派遣工作人员。

去年 7 月发生的神户事件也突出地反映了异常时代的变调。案件发生在阪神大地震后的作为复兴事业建立起来的市办住宅区内。68 岁的老人胁迫 43 岁的女士与其发生性关系，一遭到反抗便对该女士拳打脚踢、实施暴力，最后导致该女士死亡。

以上的两个案例是非常极端的事例。像去年发生在茨城的悲剧，无论它发生在我们身边何处都会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不是吗？78 岁的母亲，其长子 51 岁，没有工作且经常施用暴力。最终母亲因无法忍受长子行为而杀死全家五口。据说案发后，近邻的居民还为她请愿减刑。

此外前年，在静冈县发生的杀人事件也是一位 88 岁的丈夫因为无能为力照顾其 83 岁且患有痴呆症的妻子而将其杀害的案件。可以说，这正是由于“老人看护老人”而引发的悲剧，在宗教看护无法介入的地方隐藏着深刻的问题。这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这些因老年人沦为罪犯而引起的杀人案件中，“杀害家人”的案例非常多，可以说这就是高龄者犯罪的特征所在。

根据警察厅文件《平成十二年的犯罪》，可知在这不足十年的时间里，60 岁以上的“老人”犯罪增长了一倍以上。其中一项具体内容是：自行车偷盗、商店里的偷窃等因经济困难而犯的盗窃罪占全部刑事犯罪的 70%。杀人等暴力犯罪与其他年代相比有所减少。但是，60 岁以上的刑事犯从 1991 年的 12 651 起到 2000 年的

29 163 起,增长了一倍以上。与此同时,高龄者所犯杀人案件也同刚才提过的一样呈渐增趋势。

或许是高龄者老后,让本该渐渐衰亡的生命力开始倒流吧,也可以说是被逼走投无路和被压抑之下的逆爆发。在衰老时期,积聚压力、难以调和与环境恶化的关系,使逐渐增加的焦躁感,失去了消散之地。这就是只能称为老人愤恨的生命不愉快吧。在崩溃家庭中,它失去了出路,开始卷入社会的边缘和黑暗处。

目前这些事件只是零星发生的社会现象,但随着高龄阶层的增大也不一定不会发展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老人愤恨的社会化很有可能产生破坏性威力。但到那时,我们的社会最终能预备好防卫装置吗?像我们的传统社会曾经所做的招魂装置,例如祈祷冤魂用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系统,能否重新建立起来呢?万一我们没有事先准备的时候,老人愤恨就可能会经过遗恨、反感的社会化,导致无政府状态的爆发。

20年前,某一医院的护士们被解雇,原因是住院的某晚期患者虽然已经接受了所有的治疗,但仍然面临着即刻死亡的危险。几位护士,深知医生们已无计可施,又碰巧她们是新型宗教的信徒,所以就开始进行信仰治疗。事情泄漏后,她们被指责是对现代医疗理念的亵渎,做了她们作为护士所不该做的事情,因而被解雇。

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很同情这些被解雇的护士们。近代医疗已经对晚期患者无计可施,出于欲罢不能的心情而采取信仰治疗的护士们,究竟为什么非要受到指责呢?近代医疗看护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刻,也正是依靠宗教看护的决定性瞬间,所以这样做又何尝不可呢?可以说在这里,护理临终病人的医生的伦理观、医院的伦理观起到了作用。

我想这不正是展示了一幅目前老人看护的讽刺画吗?

现在老人们处在这种极端的场面,即将被历史宗教和近代医疗抛弃。这种不安与怀疑的想法开始腐蚀老人们的心灵。无法治愈的老人愤恨的矛头,不是已开始转向某一方向爆发了吗?

映在他们目光里的是,历史宗教未来展现的广大自然的形象,是天地万物乃生命寄宿处的意识,也可称做“万物生命教”。如果回顾历史五千年、一万年,地球上所有的民族应该共有的可以说是最普遍的宗教意识。

因篇幅有限无法详述。我认为,现在除了这个“万物生命教”以外,再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平抑这个高龄化社会里老人的愤恨。

注 释

[1] 莱昂·麦克斯·莱德曼(Leon Max Lederman), 美国物理学家, 1922年7月15日出生于美国纽约。他同施瓦茨和斯坦博格一起合作进行的中微子研究, 在1988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莱德曼就读于纽约城市大学, 并于1951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留校并于1958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系的全职教授。

(引自 http://www.britannica.com/nobel/micro/342_73.html)

[2] 指2002年3月27日在芝加哥大学“核之钟”被拨动时的照片。此钟象征性地指明直至毁灭性核战争爆发之时的所剩时间。它被拨动前进了两分钟, 距离核战争爆发只剩下七分钟。

(引自 <http://www.jca.apc.org/~tkopeace/mg26-2.html>)

[3] 出自《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4节。

英文 Blessed are those who mourn, for they shall be comforted.

中文翻译引自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新旧约全书》1994年版。

[4] 亲鸾(1173—1262), 镰仓初期僧人, 净土真宗鼻祖。别称范宴、绰空、善信。谥号见真大师。相传是日野有范之子。最初在比叵山学习天台宗, 后入法然门下专修念佛。1207年遭到停止念佛的迫害, 被流放至越后。赦免后, 长期在关东布教和著述。贯彻法然思想, 主张通过绝对他力到达极乐世界, 提倡恶人正机。其主要著作《教行信证》即是从他人力量的立场对净土宗教理进行了纯化和系统化。此外还著有《唯信钞文意》等。其中唯园编的法语集《叹异抄》很有名。其妻惠信尼。

(引自 <http://dictionary.goo.ne.jp> 三省堂提供:《大辞林》第2版。)

[5] 道元(1200—1253), 镰仓初期禅僧, 日本曹洞宗鼻祖。京都人。号希玄。谥号承阳大师。久我通亲之子。于比叵山天台宗建仁寺学习禅宗。1223年入宋学法。归国后, 在京都深草建兴圣寺。1244年迁至越前, 创建了大佛寺(即后来的永平寺)。因提“倡修证一如·只管打坐”的纯正禅风而闻名。著有《正法眼藏》、《永平清规》等。

(引自 <http://dictionary.goo.ne.jp> 三省堂提供:《大辞林》第

2 版。)

- [6] 日莲(1222—1282),镰仓时期僧人,日莲宗鼻祖。字莲长,谥号立正大师、安房小湊人。12岁始入佛门,巡游各地研习各派教理。因其悟得非《法华经》不能确保末世国家平安,遂于1253年开创日莲宗。而且通过街头说教尖刻地抨击、驳倒其他宗派。1260年因向幕府进献《立正安国论》,预言国难当头,而被流放至伊豆。赦免后由于继续对幕府、诸宗派进行批判,险些被斩杀于龙口,遂被流放到佐渡。后获准隐居甲斐身延山。1282年死于武藏国千束郡,被封六老僧。著有《开目钞》、《观心本尊钞》等。

(引自 <http://dictionary.goo.ne.jp> 三省堂提供:《大辞林》第2版。)

- [7] 所谓真光之业就是指接受高次元的神灵之光,并通过手掌传达的宗教行为。它能净化灵魂、精神、肉体、物质等一切事物,并使之朝向好的方向发展变化。人的额头深处有魂灵的存在。这个魂灵可借真光之业还原神灵之子的面目。真光之业就是让人复活成神灵之子,为宣扬神灵的经纶而从神灵那里获取的东西。

(引自 <http://agent-k.biz/dencyo/index.html> 世界真光文明教团·田园调布中心。)

功能、结构和语音演变

[法] 马丁内 (André Martinet) 冯蒸 译

一 引言 (Introduction)

今天,就像二十年前一样,许多语言学家还会毫无保留地同意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的“语音演变的原因是未知的^[1]”这一观点。很多人都能推断出这样的结论:任何致力于发现原因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注定走向失败。把语言学主要甚至专门看成是在共时层面和进化问题中的描写性学科的学者们会非常自然地青睐这些观点,因为他们有理由停留在直接可察的事实上不再去深究,如“英语的 p 和 b 是不同的音位”,或“法语的 u([ü])相当于拉丁语的 ū”。新语法学派(neogrammarians)的追随者们准备考虑言语链中的相互影响,但是他们忽视甚至可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给定的音位的性质取决于模式中相邻音位的性质。他们会发现自己的观点与那些音位学家们并没有什么两样。这些音位学家们认为“结构”(“structure”)来自于言语链中不同单位组合的平面,而不是基于各单位语音的异同。如果谁把音位模式只看成是总结言语中音段行为的一种捷径,他就不会认为那是一种重要的现实。作为建立基于语音异同模式第一步的音位构成成分分析仍然被经常看成是一种有趣的、但毫无价值的传统方法的改良,它的深广的意义很少有人洞见。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持结构主义观点的语言学家们^[2]认为它为更好地理解语音演变铺平了道路。

看来阻止接受历时性音位学为正统学科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人们普遍认为语言学如果冒险超出纯描写的范围，将使它得不易的科学性质受到伤害；另一个是，一种不合理的信念在起作用，认为对于语音为什么会变的问题答案应该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可以显示不能用于解释随机选取的任何变化的解释规则被弃为不合法。这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在有条件的语音变化问题上，一些语音学家拒绝接受明显的条件因素可提供部分答案的观点。在古英语中 *céosan* 中的元音间的 *s* 的发音已经变成了 [z]，而其他位置的 *s* 的发音仍为 [s]，我们深信，在语音演变中，元音间的位置是起作用的。但是，当然元音间的位置并不够，因为古冰岛语 *kjósa* 中保留了一个清音 *s*，并且数以百计的可容易识别的语言中没有关于浊化它们元音中间啞音的记载。那些位置的元音使古英语的 *s* 大受元音环境的影响，有些人认为，那个惟一的因素才能被命名为“原因”（“cause”）。我们难道不能想象一下吗？浊音化可能是语音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之一（元音间的位置）我们知道了，其它的呢（口音的性质或其它不同的韵律特点）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如果我们必须区分它们，界限将很难划清，因为它们具有错综复杂的不同的性质，而又建立在我们碰巧知道的这个或那个的基础上。把任何事情认定是重要的或不重要的，在方法论上都是不正确的。总之，我们无权认定它们属于同一个或同一类型，在以前的发音中我们找不到这一类发音的证明，任何语音演变原因的理论必须绝对扫地出门。布龙菲尔德的语音演变未知的观点将被另一个观点替代，有些演变的原因仍然既是未知的，也是难以辨认或证实的。这绝不意味着语言学活动就会被限制在描写的范围内，相反，它可能会引导读者去探索减少未知领域的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语音演变的外在因素，已经成为颇具理论性，但却缺少实际观察的客体，在这些因素中，方言间和语言间的影响占据了显著的位置。在内部因素中，只有那些可能在言语链中发现并解释音位变体差异的才被语音学家们付诸多少还算彻底的检验中。在多大程度上，一组音位单元模式中的共存现象能够解释它们的共时性质和历时行为还有待于探索。我们知道一个 [s]，放在一个给定的言语环境中时，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制定当 /s/ 放在一个给定的模式框架中时，我们能期望到什么。

即使我们拒绝把语言学当作历史性的学科,语言学的核心问题仍是语音演变的原因问题,因为在我们弄清语言为什么会变化之前还不完全了解语言是什么和它是怎样起作用的。没有人能够断言形态、语法和词汇的变化不考虑说话人之间交际的需要。对于音韵学其正确与否有待证明。如果它能够表明语音演变并非我们前辈所说的“无法控制”的话,我们就能够发现不是全部而是部分至今未知的语音演变的因素了。

接下来,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到“规则的”(“regular”)语音演变上,就是所有给定音位的功能在所有的场合或限定的环境中都会最终凭此受到影响的那种类型。音韵变化有很多种,有些变化可能与那些被看成是规则变化的原因相似。但是,有人认为考虑音韵变化可能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应该再次进一步强调的是,我们最终关心的是说话者在一个模式中区分或合并不同音位的行为,而不是到目前为止已经实际上预先占据了历史语音学家的头脑中的东西,即言语链中连续音位的相互影响。目前已有了一套公认的理论:出现在不同位置的同一音位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并且它不需要再进一步强调了。在现在解释的框架中,一个变化是在所有的情况下影响一个音位,还是仅仅在限定好的情况下影响根本不重要,最终被合并或保持不同的是两个音位还是两个不同音位合并的变体也不重要。我们知道语音演变中组合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把功能上和结构上的因素区分开,我们必须重视这些因素并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把前者排除在视野之外,为了使评注简单化,不必强调每处存在的音位变体偏差现象,同时应建立如下条约:除非以另一种方式陈述,所说的音位的情况同样适用于那些语音演变刚巧发生偏移的音位变体。在理论讨论中,看起来我们好像总在处理那些变体从未发生变化的音位。例证表明音位变体也包括在内。音位变体经常出现在音位串的形式中:一个/k/的前音位变体有/ki/ ,/ke/或既有/ki/又有/ke/。换句话说,我们不用再处理单个的音位/k/而是音位串/ke/,/ki/。从事实上看,在音位演变的过程中,音位串是由单个的音位聚结在一起的。并经常对单个的音位形式起作用。音位串替代了音位变体实际上使应用简单化了,我们可以根据上述所关于音位变体应用方面的论述同样应用到音位上:除非另有说明,我

们所说的关于音位的情况也适用于更大的音位集合。

二 功能(Function)

显而易见,每个人对同一单词给定音位的发音都是不同的。这种差异很细微,但是严格说来,任意两个的发音都是不同的。在某种条件下,这种变化是相当大的。总之,即使一个人的言语,我们都必须考虑可能分散的程度,并且如果我们考虑一个给定的团体中所有的发言者有很多的话,分散的可能性会更大。如果我们用音位的变体差异来考虑一个音位,那么分散程度的存在显然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一个音位实体的实际发音情况很大程度取决于具体环境,如英语的/k/,它的分散程度覆盖了大部分顎位区,还有俄语的/a/,它也取决于具体环境,有从[æ]到[a]的不同。但是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不是由于组合变形而导致了分散,而是什么会影响一个典型环境的一个音位。

一些学者试图把德·索绪尔(de Saussure)的论述理解为:语言的“值”(“value”)是没有偏差程度的^[3],因为所有的音位由于受到另一些音位的影响可以产生偏差。这并不完全正确,去想像[œil]的分散程度是毫无意义的,对说英语的人来说,它可译为“苍白”(pale)或“失败”(fail),因为[ø]既不是/p/也不是/f/的正常表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任何人说[œil]可根据上下文解释为“苍白”(pale)、“提桶”(pail)或“失败”(fail)。在同质的言语社团框架中,很可能每个给定环境中音位的正常的分散程度并不与它的前后音位相邻近,而是会有保险范围。我们这里谈到的“正常”(“normal”)范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在特殊条件下,和它相邻的形式的音位就会完全合并,那么很明显占用保险范围的小错误也会在“反常”(“abnormal”)的情况下发生。这里谈到的反常的情况不会仅影响单一音位的发音而是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这种形式的音位,它们本身是可见的反常的标记。听者会不知不觉地宽限它,给偏差打折扣,或更多地依赖于他们所听到的有关语境和形势的解释。在反常的情况下,我们也许会还把还没有完全精通那类语言的外国人说语言的情况包括在内。在此我们更应该宽限它们。

为了全面理解以下所说的,我们应该铭记,在任何情况下来说

更倾向于不精确,就像叶斯柏森(Jespersen)所说的:“削木片比做白内障手术容易得多。”^[4]对孩子来说,学习说话、写字、画画的主要难点不是如何发声、写横线、画线,而是根据交际的需要,迅速作出正确的发声,写好横竖,画好曲线。这同样也适应于成人的音位。对任一个人来说,至少在给定的上下文中,一定会有一个被我们称为每个分散程度重要性中心的最佳效果,但是实际的工作情况会与标记有所偏差。在普通的语言实践中,一些甚至差得更远。如果濒临其他音位重要性的中心的话,它们会被更正,并且无论如何都不会被效仿。如果非常规地偏离正轨,轻微地超过了正常的分散程度,但是不会引起误会,它们决不会对削弱相互间的理解构成威胁。如果不的话,它们本身只会给器官施加少许的压力,由于是在可接受范围的适当延伸,发音不会有问题。

音位(在给定的上下文中此后的都如此理解)在一个方向或其他方向稍有转移,我们就应该考虑语音转移,依据的是与邻位分离的保险系数,是增加还是减少。我们不会在稍有转移的可能情况下就开始讨论,而是试图决定它是如何影响这种结构的其他音位。让我们把 A 称作正常范围正在转移的音位, B 与 A 分离的系数在增加, C 与 A 分离的系数在减小。它们的情形如下图所示:

$$B \quad A \longrightarrow C$$

如果按通常所说:“语音演变律盲目地起作用”(“phonetic laws work blindly”)即不顾人们交际的需要,那么 A 和 C 必然会合并,除非因一些神秘的原因,这种趋势停止或翻转过来。如果 B 与 C 也像 A 一样有同样的发展方向,那么它们的关系将变为:

$$B \longrightarrow A \longrightarrow C \longrightarrow$$

可以推知是由同种未知的原因为同种程度地影响这三者。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证明 A 在 B 和 C 之前就开始转移。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也许会说,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为, A 更易被转移从而在另两者之前先发生转移。如果一个人不倾向于经济的观点,那么他也当然会对这三种不同的转移假定三种不同的理由。

对这个问题,功能主义者的基本假设是认为音移(sound shift)一定会考虑交际的需要,并且音变面貌的因素之一是通过保存有效的音位对立来保证相互理解的基本需要。为了避免我们处理语言问题时会有这样的感想,我们必须对各种可观察到的现象的机理提出一个更合理更详细的分析。

我们再回到前述的情况——A 向 C 转移并远离 B,并注意 B